



中国古代陵墓研究中的资料选择与利用问题*

刘毅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考古与博物馆学系)

摘要:陵墓是中国古代墓葬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相比一般墓葬而言,陵墓的研究内涵更为丰富,研究资料的数量和种类也相对更多。涉及到中国古代陵墓的资料主要有礼制典章类史籍、档案资料、私家相关著述和诗文笔记、地方志资料、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堪舆理论资料、实地踏察访谈资料等几大类。在具体分析研究过程中,这些不同性质的史料如何比堪取舍,对于最终得出结论的真实可靠性具有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陵墓,研究,资料

Abstract As one of important part of ancient Chinese tomb, the meanings of the imperial mausoleum are abundant and related references are rich in quantity and kind. The main materials include historic records of ritual regulations, documents, concerned books, poems, notes, local gazetteers, archaeological reports, geomantic principles and investigations and so on. The reliability of final conclusion is influenced by the comparison and choice of these references in great extent.

Key words Mausoleum; Research; Reference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是历代帝王墓葬及其附属设施和各种礼仪、建制规范的总和,“陵墓”或“陵寝”的内涵不仅包括埋葬的本体,还包括了陵园建筑和其他一切附属设施。陵墓是中国古代墓葬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相比一般墓葬而言,陵墓的研究内涵更为丰富,研究资料的种类也相对多,主要包括:礼制典章类史籍、档案资料、私家相关著述和诗文笔记、地方志资料、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堪舆理论资料、实地踏察访谈资料等几大类。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对于这些不同性质的史料如何比勘取舍,对于最终得出结论的真实性具有很大的影响。

一. 礼制典章类史籍

皇陵是国家的重要建置,历代官私所修正史、礼书中一般都有记载,这种记录有时可能会由于特殊原因而有所曲笔,但涉及典章制度的部分大多是忠实记录。中国古代对于帝王陵墓制度的关注和研究

起源很早,在儒家经书和先秦诸子中即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与讨论,如《易·系辞》、《礼记·檀弓》、《周礼·春官》等。《周礼·春官》中有“冢人”和“墓大夫”条,记载这两种官吏分别负责修治“公墓”和“邦墓”,对于排列墓葬位次和等级制度以及相关的祭祀等事项都有明文规定。和历史学、考古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关于先秦陵墓的研究资料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在历代官私纪传体正史中,有关陵墓制度的记载多见于《本纪》、《礼志》以及有关人物的《传》等。《史记》中就有若干条关于上古帝王陵墓的记载,东汉班固在《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中记载了西汉末年刘向对于“不封不树”时代一些古帝王陵墓方位的考订意见,在此后的“廿四史”中,这类记载还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在其他体裁的史书中也有若干陵墓方面的资料,如东汉刘珍《东观汉记》中关于东汉皇陵的记载对于东汉皇陵位次的判定就具有及其重要的价值,同样是编年体的《资

* 本研究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NCET)“清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批准编号:NCET-07-0453)阶段性成果之一。

治通鉴》中也有一些不见于纪传体正史记载的古代陵墓资料。至于完整保留下来的《明实录》和《清实录》，更是明清两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重要的史料渊薮。

一般史书中关于古代帝王陵墓的记载大都比较简略，散见而不集中。相比较而言，官私所修礼制典章类史籍中有更为集中的陵墓资料，如官修《汉官仪》、《汉旧仪》、《唐六典》、《大唐开元礼》等，历代《会要》中也都有关于所述时代或其前代陵墓的记述。在历代官私所修《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会典》等典章制度类著述的相关条目中则有更多的著录。唐宋以后，保留下来的史籍渐多，像《宋会要辑稿》、《大明会典》、《大清会典》（含《会典事例》、《会典图》）等，分别是研究宋、明、清等时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性文献史料。和一般史料相比，官修典章礼志类史籍对于历代皇陵制度研究具有更准确、更可信的资料价值，这类史籍大都归入史部“政书类”。

应该说，历代官私史籍，特别是礼制典章类史籍，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最基本的史料来源。

二. 档案资料

档案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资料之一，而且非常重要，但早于明代的档案已基本不存。在现存为数不多的明朝档案中，虽然有一些涉及明代帝王陵墓的文字，但主要是讨论帝王后妃丧葬典礼，以及明末内忧外患中皇陵的防护等问题，极少见直接关乎陵墓制度者。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初八日的《兵部为宣大总督报捐输助陵工各官员名钱数并请敕议叙事行稿》奏报依靠“各官输助修浚”，建成了保卫昌平陵区的“陵后墙濠”工程，这是关于皇陵兆域外围防护设施修筑的原始记录。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档案资料可能已经亡佚，如《明孝宗实录》卷二〇九、沈德符《万万野获编》卷三、清朝官修《明史》卷一一三中，都提到明孝宗曾向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出示《裕陵图》，联系其前后记述文字判断，此图所绘应当是明英宗裕陵之玄宫结构。又，天启元年（1621年）正月，大学士韩爌自天寿山光宗庆陵工地回京，以新卜吉地形势、规模等事奏闻熹宗：“建造奉旨一准昭陵，该内监賚有工部原绘《陵图》，遍示诸臣，中加石桥一道，尤为合法，更于宝城后因山增筑，庶称尽美”。这段奏对中也提到了昭陵或庆陵有《陵图》，并透露出此

图为工部所绘，内容可能是地面建筑、用于施工等信息。这类《陵图》所蕴涵的资料信息无疑非常丰富而且重要。

保存较多的清代档案中关于帝王陵墓的记载相对比较多，散见于历代皇帝或皇太后的“大事档”，相关“工科题本”、“奏销黄册”，以及历朝“上谕档”、“朱批奏折”等。还有一些专著性质的专题档案资料，如《陵寝易知》以及光绪朝英廉重修的《昌瑞山万年统志》等。晚清百余年间关于慕陵（宣宗）、定陵（文宗）、定东陵（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惠陵（穆宗）、崇陵（德宗）等帝后陵墓工程做法的档案资料对于清代皇陵制度、尤其是地宫制度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样式雷”所保留的烫样、地盘图等图像或图形资料，对于清仁宗昌陵以后地宫制度研究提供了最直观、最可信的依据。

三. 私家相关著述和诗文笔记

私家关于礼制类的专著、其他专题著述、学术笔记、诗词歌赋、札记中的有关条目等，间或也有一些关于古代陵墓制度研究的重要资料。如传为东汉伏无忌所著《古今注》，对于东汉皇陵园建置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为东汉皇陵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类似的著作还有东汉王符《潜夫论》、蔡邕《独断》，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宋李攸《宋朝事实》、周必大《思陵录》，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徐乾学《读礼通考》、赵翼《陔余丛考》等。现存关于陵墓的专著主要是明清时期的作品，如明王在晋的《历代山陵考》、祁光中的《关中陵墓志》等，清代则有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梁份的《帝陵图说》和朱孔阳的《历代陵寝备考》等。

一般来说，私家著述不如官书重要，而且有些是多次转述甚至道听途说，因而其准确性要打折扣。诗词歌赋等文学性较强的作品，还往往会有渲染乃至夸大的成分。但是官书却往往遗漏一些不被礼仪所重视的重要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却经常是研究某些问题的关节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当事人各种形式的记录（包括回忆追记）就会凸显出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如出于宫廷斗争等原因，明英宗裕陵玄宫形制是明朝皇陵玄宫中的一个特例，而它可能也是最终解开明代帝陵玄宫制度前后变化之谜的关键。明人关于裕陵的记载扑朔迷离，在可信的官方文件（如前揭“陵图”等）缺失的情况下，当事人的记录就显得尤其重要。弘治十七年（1504年）三月十六

日,明孝宗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至西角门议周太后陵庙事,“上袖出裕陵图一纸,指示陵门内有二隧道,其一西北行转而至者为英宗皇堂,虚其右圻而中有道可通往来。其一东北行转而至者为孝庄玄堂,相去可数丈,中隔不通”。李东阳的这段记录,是目前所知对裕陵玄宫布局最详细的记载。

一些看似对于礼制研究史料价值不甚重要的诗文词赋等,有时也包含有古代陵墓研究所需的关键性资料。如南宋皇陵在历代皇陵的著录和研究中一直是薄弱环节,甚至诸陵的位次也有异说。判定南宋皇陵位次,最重要的资料毫无疑问应该是《宋会要辑稿》,该书记录了孟太后至宁宗诸帝后攒宫的卜选和兴建,但它所著录的是有关人员奏疏和皇帝批答,涉及的陵墓整个营造过程,对于各陵相对位置的记载只是间接的,有时关于同一座攒宫的先后不同记载,还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宋宁宗末年,魏了翁奉诏祭谒绍兴诸攒宫,其纪事诗中有“先从攒殿拜昭慈”、“次从祐阜至思崇”等句,所附“自注”云:“先昭慈,次永祐上下宫,次永阜上宫,次永思上下宫,次永阜下宫,终永崇。谒之日以道便,祭之日仍以尊卑得次”。以这个记载和《宋会要辑稿》中的有关记载相参校,就可以基本准确地推断出南宋诸陵的次序。

四. 地方志资料

我国自古以来重视修志,除最多见的府州县志外,也有省志、全国性的“一统志”,还有一些特殊的方志。对于各自的所在地而言,古代帝王陵墓是重要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财富,在地方志中一般都有著录。唐代以来全国性的地志中,如唐李泰等《括地志》(存辑佚本)、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元李兰盼《大元大一统志》以及明清历次重修《一统志》等,有若干关于古帝王陵墓的著录。现存宋元明清各种官私所修地方志中也保留了多条古代帝王陵墓的资料,一般在“陵墓”、“古迹”、“山川”和“金石”、“艺文”等门类中,“陵墓”或“古迹”、“山川”门所记多为古代陵墓的方位、道里、世次等,关于陵墓制度的具体记录资料比较少,但这些记载却为各地陵墓的考古调查和指认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金石”、“艺文”门著录部分碑文、圻志文和祭谒诗文等,一般来说对于陵墓制度研究的直接价值并不特别大,但可以提供一些间接资料。

由于古代帝王陵墓多集中分布在同时期的都城附近,因而都城方志中的帝王陵墓资料相对集中,如南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张昞《宝庆会稽续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清末周家楣等《光绪顺天府志》等;而明清两代历次所修的《昌平州志》、《遵化州志》、《易州志》,对于各自封域中的明清皇陵分别做了更为详尽的著录。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地方史志,专门著录某些古代都城的史事,书中有比较集中的陵墓资料,对于古代陵墓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成书于汉晋间作者失考或者尚存争议的《三辅黄图》、《三秦记》、《关中记》等,内有关于西汉皇陵的重要记载。唐代以后的这类书籍保留下来的更多,如宋代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李好文《长安志图》,明代柳瑛《中都志》、曾惟诚《帝乡纪略》,清初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乾隆时于敏中等奉敕编纂的《钦定日下旧闻考》等。

五. 考古调查、发掘资料

随着近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20世纪20年代,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的发掘是中国古代陵墓考古发掘的开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另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刘敦桢、朱偁等先辈研究者对于南北两京附近的明清皇陵、南朝帝王陵墓石刻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测绘调查,开启了古代帝王陵墓科学调查的先河。此后,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成为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中最基本的资料依据。

陵墓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提供了陵园建筑结构、建筑物布局和规格、墓室(玄宫)结构和规模装饰等基本信息,墓中随葬品还蕴含着墓主身份、墓葬年代等重要信息;陵墓的考古发掘材料具有其他各种文献资料无可比拟的准确性和直观性。最近五六十年以来,历代帝王陵墓的考古调查和抢救性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陕西西安周围的秦始皇陵和西汉、唐代若干皇陵以及河南巩义北宋皇陵等持续多年的考古调查和局部发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帝王陵墓的调查和发掘,是秦汉至元明时期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半个世纪来的秦汉至宋明时代帝王陵墓考古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人们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陵

墓制度发展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与之相适应,对于古代帝王陵墓研究的着眼点,也从以出土文物为重点,转移到了以陵园结构和陵墓制度本身为重点。

墓葬出土时的某些现象和相关资料有时还会透露出某些其他种类史料很少能够记载的重要信息。明朝益藩后代几代亲王陵墓均不建玄宫,采用石灰椁葬制,已发现的实例有益宣王墓和益定王墓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很普通的墓穴之制,没有等级标记,一般官员直至庶民都可以使用。益藩贵为亲王,采用这种简陋的墓制并不是因为个人品性节俭,而是另有原委。据《益恭王圻志》记载:“(恭王)吴妃薨,营葬于南城县资盛山之原,比世孙(益宣王)奉命开圻合葬,而水蚁交侵,哀恸几绝,权同吴妃厝于浅土。具书上请,亟图改卜,情词恳切。上嘉其孝,爰命壶[壶?]史金儒驻[往?]彼相视”。查《益恭王妃吴氏圻志》,吴妃卒于万历元年(1573年)五月八日,次年四月十七日,“葬于金华山左资胜山之原”。益恭王厚炫卒于万历五年(1577年)闰八月二十八日,吴妃葬后仅三年多墓地即遭“水蚁交侵”,所以益宣王才冒禁上疏请求改卜茔地。大约是金华山一带地下水位较高等原因,此处的益藩诸王陵大多保存不好,益庄王朱厚焯卒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五月二十二日,次年三月十七日葬金华山,其元妃王氏先卒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与王合葬。其继妃万氏卒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八月十三日,嗣益王翊钊“奏奉谕旨,扶柩附葬,开圻睹朽,更斂[殓]易棺,次年辛卯正月五日,重修勒石”^⑩。益庄王墓发掘时发现,王及二妃三棺并置于棺床上,棺四周砌有高1.2米的砖墙,墙内以石灰将三棺之间及棺与墙之间的缝隙填实^⑪。这种做法不符合明代帝王一般的将棺椁露陈于棺床上的埋葬通例,棺隙间填充石灰,无疑是一种防潮和防虫蚁设施,这是不改葬地而避免益庄王夫妻重葬后再遭水蚁之害的一种补救措施。万历年间的两次“开圻睹朽”、“水蚁交侵”,最终促成了益藩诸王玄宫制度的变化。石灰椁是取其防潮防蚁之用,非取其节俭,这是益藩玄宫结构简陋的最根本原因^⑫。

六. 风水理论资料

“风水术”也称“堪舆术”,其著述古代归入地理类。“风水”二字源出伪托晋人郭璞所纂之《葬书》:“《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⑬。风水之论可

能肇始于先秦时期,传说秦始皇下令在孔子墓前挖洙水,欲以泄儒家灵气。又《博物志》记载:“汉滕公(夏侯婴)薨,出葬东都门外,公卿送丧,驷马不行,踟地悲鸣,跑蹄下地得石室,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⑭。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明帝司马绍会“解占冢宅”,曾微服私访郭璞为人所择葬地^⑮。南朝时期,风水术对陵墓制度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南朝陵墓随山水之宜,应该是这方面的反映。北宋以后,皇陵受堪舆术影响日益明显。除上揭《葬书》外,对于历代皇陵影响比较大的堪舆著作还有金元间成书的《大汉原陵秘葬经》、明代李国木辑《地理大全》、清朝陈梦雷等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堪舆部》等。

风水术虽常为学人所不齿,但它对于皇陵卜选和建置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清末。确切的证据表明,至少在宋、明、清等朝代皇陵的兴建过程中,都又一个按照所宗奉的风水理论卜选基址的程序。根据各朝代所宗奉的不同风水理论,可以结合山水走向判定各陵墓之间的位次关系、依先后尊卑推定已经失考的古代帝王陵墓的位置,还可以对某些建筑物的功能做出准确判定。

七. 实地踏察与访谈资料

上述诸种资料,无论是历史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实例,对于非亲身调查发掘的其他研究者而言,都是“纸上得来”的第二手资料。要真正深入研究,研究者个人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十分必要。汉唐皇陵的浑雄气度、北宋和明清皇陵的山水凭依,非到现场是无法真正领略其风采的,而陵园或其遗址各建筑的布局与其地位功能、墓室结构的主次关系及使用功能的划分等,也只有现场观察才能得出更准确的认识。现场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感性认识,还可以采集到一些当地的口述史料,这些可以为时代晚近的帝王陵墓研究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是辨伪依据。以现场调查资料佐证考古、文献资料,许多在书斋里的难题会迎刃而解。

古代陵墓制度研究涉及到历史学(特别是典章制度)、考古学、古建筑、地理环境学等很多方面,综合交叉,史料来源丰富多样,关于古代帝王陵墓的各种文献记载也比一般墓葬要多,必须把田野调查发掘资料和多种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比较甄别后取舍利用。只有这样,才更能发现问题并进一步去解

决问题,研究成果也才能更有深度和广度。1925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正式提出了用“二重证据法”治史之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①。从《古史新证》的阐释以及王观堂自己的实际应用中可以看出,“二重证据法”的最初提出,主要是指利用出土的甲骨金文等古代文字资料研治中国上古史。随着中国考古学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二重证据法”的应用范围也在逐渐扩大,现代研究者可以把“二重证据”的内涵扩充理解为所有古代文献和一切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包括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古器物资料以及各类标本等;而它的适用范围也应该从上古史扩大到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领域^②。随着历代帝王陵墓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大量的相关历史文献不断被发现和重新刊印,使得今人之研究比诸前人越来越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现代研究者有条件充分搜集不同性质的“多重证据”,将其对比勘合,互相补充印证。古代陵墓制度中不同的具体研究课题对史料的需求有不同的侧重,但引证材料越广泛充分,得出的结论也就越坚实可靠。

注释: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影印本第43册,第35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明·温体仁等:《明熹宗实录》卷五,天启元年正月癸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缩微卷本《明实录》,第66册,第252页,1962年。

明·李东阳:《燕对录》,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九,许大龄等点校本,第11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十,《八月七日被命上会稽沿途所历拙于省记为韵语以记之舟中马上随得随书不复叙次二十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集部四,别集类三,第1172册,第15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刘毅:《南宋绍兴攒宫位次研究》,《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6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明·佚名:《益恭王圻志》,引自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51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明·佚名:《益恭王妃吴氏圻志》,引自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519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① 明·佚名:《益庄王继妃万氏圻志》,引自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511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焯墓发掘简报》,见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内部刊印,1977年。

③ 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第519—520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④ 晋·郭璞(传):《葬书》(内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08册,第1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⑤ 晋·张华《博物志》卷七,“异闻”,《诸子百家丛书》本,影印《四库全书》本,第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⑥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下卷上“术解第二十”,“郭璞选葬龙角”,排印本,第173页,岳麓书社,1989年。

⑦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第2—3页,影印北京来薰阁1935年之影印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⑧ 刘毅:《“二重证据法”新论》,《南方文物》1997年第3期。

(责任编辑:周广明)